

# 铁面女人

贝别洛娃 著

钟大能等 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 铁 面 女 人

贝别洛娃 著 钟大能等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0千字 插页4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67·447 定价：1.55元

印数：00001——26500册

## 目 录

---

|         |       |
|---------|-------|
| 开 端     | (1)   |
| 爱情和监狱   | (57)  |
| 斗 争     | (96)  |
| 意大利幕间曲  | (147) |
| 交 易     | (190) |
| 为生存而活下去 | (234) |

# 开 端

往昔是序幕

《暴风雨》

早在20、30年代，世人对她的身世传说纷纭。传说她毕业于剑桥大学，先后将60多部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还说她久居伦敦，被尊称为扎克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本肯多夫伯爵夫人和布德别尔格男爵夫人，其父曾在彼得堡任高级文官和枢密官，而普希金和维亚泽姆斯基为之献诗的莫斯科省长夫人——阿格拉费娜·费多洛夫娜·扎克列夫斯卡娅则是她的曾祖母或高曾祖母。B·Φ·霍达谢维奇至死也坚持认为，普希金所塑造的“青铜维纳斯”是穆拉<sup>①</sup>的先祖，而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在其晚年的著作中称她是一位俄国贵族妇女。

实际上，这种种逸闻都是她自己杜撰编造，逐渐传播开的。她确实是枢密官伊格纳季·普拉托诺维奇·扎克列夫斯基之女。但此人与娶阿格拉费娜为妻的阿·安·扎克列夫斯基伯爵毫无关系。穆拉的第一个丈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本

---

① 穆拉是本书女主人公扎克列夫斯卡娅的小名。——译注

肯多夫（生于18世纪80年代末）并不是本肯多夫伯爵家族的直系，与尼古拉沙皇的驻外大使，宪兵头目<sup>①</sup>的外孙本肯多夫也只是远亲，属于旁系。因此，穆拉的丈夫尽管出身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之家，但并不享有伯爵封号。至于剑桥大学，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不接受女生。当时剑桥开设了两所女子中学：一所是1869年开设的希尔顿中学，另一所是1871年开设的新罕姆中学。但穆拉并没有在这两所中学毕业，只是在某一年的冬天到新罕姆中学进修过自幼就懂的英语。1911年，穆拉的父母送她到英国，把她交给异母长兄普拉东·伊格纳季耶夫·扎克列夫斯基照管。那时，他正在俄国驻伦敦大使馆任七等文官。至于传说的60多部译著，当然没有，也不可能。1924年，她曾对一位好友提到过“36”这个数字。不过，无论在她说此话的1924年，还是她逝世的1974年，其译著都没有达到这个数目。直到她作古之时，集50年之功，总共约有20部译著，而且并非都译自俄语。

在种种传说中，唯一属实的是，她第二次结婚后确实享有布德别尔格男爵夫人的尊号，而且一生保留着它（布德别尔格这个名字在苏联鲜为人知，因此她经常使用扎克列夫斯卡娅——本肯多夫这个姓。高尔基献给她的巨著《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则使用了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扎克列夫斯卡娅）。她至死没有放弃布德别尔格这个姓，尽管与布德别尔格男爵几乎是在新婚的第二天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我记得有一次，霍达谢维奇问她对那位被普希金提到过

---

<sup>①</sup> 普希金在世时，沙皇指派负责监视普希金的宪兵头目。——译注

的曾祖母有何感想。

穆拉有时很善于不正面回答问题。这次，她那严肃、聪慧，又显得美丽的面孔，忽然变得妩媚可爱了。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一言不发，陷入沉默。

穆拉在讲述其伯爵世家的家史时，不止一次地提到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扎克列夫斯基（1783—1865年）夫妇（阿尔谢尼于1830年获伯爵称号，一生没有子嗣）。她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乐于倾听。阿尔谢尼是特维尔省贵族的后裔，安德烈的曾孙。安德烈曾于1655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作战并被俘，后来在喀山县赐给他领地。阿尔谢尼最初在近卫军里服役，参加了芬兰战争和土耳其战争，1811年被任命为巴尔克莱·戴·托里的副官，1813—1814年是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侍卫官。1828年尼古拉一世任命他为内政部长并保留自1823年担任的芬兰省长——将军的职务。由于他勇于同霍乱（就是把普希金滞留在波尔金诺的那一场瘟疫）作斗争，被晋升为伯爵。但防疫效果极差，霍乱瘟疫更加蔓延，因而他不得不于1831年退休。直到1848年他才以莫斯科省长和将军的身份重返政界。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对莫斯科臣民总是无事不过问，甚至干涉别人的家庭事务。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沙皇亲自授予他的权力。1859年，亚历山大二世解除了他的职务，他终其天年。

他娶阿格拉费娜（1799——1879）为妻，而她视普希金为宠儿。普希金曾向她献诗两首。在这两首诗（“肖像”和“宠儿”）里，普希金对她那“狂热的”、“叛逆型的”和“丧失理智”的激情赞叹倍至，甚至在《叶夫根尼·奥涅金》的第8章的第16行中，她以尼娜·沃隆斯卡娅，即嫁给

将军的塔季扬娜的名字再度出现。

霍达谢维奇至死也不知道，普希金的这些诗句与穆拉毫无关系。过去他有时把这些诗句读给她听，并且表示：“既然有这样一位祖母，那就不必再去寻找生活的范例了。”这时，穆拉总是微眯起眼睛，懒洋洋地伸伸腰。不管怎么说，她是很会忸怩作态的，尽管她有一副勇敢、坚毅和严肃的面孔。

伊格纳季·普拉托诺维奇·扎克列夫斯基完全属于另一个家族。他出身于小俄罗斯人<sup>①</sup>奥西普·卢基扬诺维奇之家。此人的儿子安德烈·奥西普维奇（1742—1804）一度担任艺术学院院长。而伊格纳季·普拉托诺维奇则是安德烈的曾孙。他是切尔尼果夫省的地主和法学界人士，在不少法律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他还在切尔尼果夫省时就开始撰写，内容涉及到继承权、保加利亚司法改革，甚至还涉及到社会平等。家庭人口增多后，全家迁往彼得堡并供职于枢密院。他逝世于1904年，官衔升至第一司首席检察官，身后留有子女四人。

穆拉是儿女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892年。她的异母长兄叫普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他是伊·普·扎克列夫斯基第一次婚生之子）。此人并不出名，仅在俄国驻伦敦大使馆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职务是侍从士官，而在驻柏林使馆的职务也不高，近似秘书助理。普拉东之后是一对孪生姊妹：安娜和亚历山德拉（阿拉）。两姊妹后来都结了婚：安娜嫁给科丘别伊，妹妹嫁给法国人姆连。

---

① 沙皇俄国对1654年重新合并于俄罗斯的乌克兰疆域的正式称呼——译注

姊妹三个都进了专科学校学习。但是我从未发现穆拉身上有专科生惯有的习惯和气质，如精神脆弱，时真时假的喜怒哀乐，孤陋寡闻，对文学艺术了解肤浅，盲目崇拜罗曼诺夫王朝的家室成员，等等。在女中学生们，特别是自由派的女中学生们看来，不去读易卜生、王尔德、古米列夫、布洛克、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著作，而去学什么行屈膝礼、女红手艺、喘气和发法语里的P音——这简直是女专科生的不幸，会使她们永世远离现实生活。她们长大成人，然后又衰老死亡，终生对现代的政治、社会、科学和美学一无所知——在我们这一代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悲的怪现象。

但是，穆拉不属那种醉心于女红、屈膝行礼之辈。她聪慧、坚毅，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非凡才能；意识到不仅是做为女性的，而且是对全人类的责任感。正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才依赖自己的健壮身体，精力和女性的魅力立足于社会。她善于待人处事，寻觅知音和与人相处。她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妇女中的精英。那个时代对她以及她那一代人既无情又残酷：出生于1890—1900年代的一代人，几乎被战争、革命、移民以及30年代的劳改营和恐怖活动消灭殆尽。

穆拉中学毕业后，前往英国。是的，是去英国，而不是去法国，也不是去德国。去法国交通较方便，生活费用较低，而且法语当时又是必不可少的。而去英国，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不是为了学一口巴黎腔，而是为了受高等教育，学习物理、化学和医学，那么俄国姑娘都愿去德国。当时穆拉的长兄普拉东正在驻伦敦的大使馆工作，他的上级是本肯多夫大使。这位普希金死敌的后裔本肯多夫可是一位伯爵。穆拉从新罕姆来到本肯多夫官邸时，常常可以

见到欧洲和英国的外交官，以及不列颠外交部的官员。在这里，她结识了最早醉心于俄国的一位英国人——莫里斯·白令。当时，他正请大使的长子，魁伟漂亮的康士坦丁讲授俄语，因此经常出入于本肯多夫伯爵夫人舒瓦洛娃的沙龙，受到夫人慈母般的关怀。正是他，后来成了俄国诗歌的翻译家，英国沙龙喜剧作家和欧洲文艺作品之友。他的作品后来曾一版再版，并成为现今已被遗忘的戏剧节目和晚期维克多利亞长篇小说的组成部分。

白令，这位卓越的人物，只能出现在20世纪初的英国和平盛世时期。他受到众人的爱戴也爱戴众人。他的足迹遍四方，人们都认识他。他非常爱戴俄国大使亚历山大·康士坦丁诺维奇全家，不仅爱戴大使，这位皇家管家和白鹰勋章获得者，和索菲亚伯爵夫人，而且爱戴大使的两个成年儿子康士坦丁和彼得。此外，他还崇拜大使的兄弟巴维尔·康士坦丁诺维奇伯爵，这位沙皇宫廷的总管家兼部长。此人后来曾出版了回忆录，介绍沙皇在皇村最后时日。他在这部回忆录里，介绍了他作为总管家和部长曾于1917年亲自把皇村酒窖里的大量百年陈酒倒入宫殿厕所的情景，以免进驻皇村和占据各出入口的革命卫队喝得酩酊大醉。

本肯多夫家里的每一个人，从管家到厨师（当然是法国人），白令都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爱护起大使家的猎犬和家犬。他曾在唐波夫省索斯诺夫卡的本肯多夫的领地里度过一个夏天，大使全家对他关怀备至，视若亲人。因此白令一直把这一段时间视为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对在伯爵家里度过的这段自由、欢快、天堂般的时日，他写下了回忆录。他们一起去狩猎，打网球，在古老的煤油灯下用德语朗

读马克·吐温的作品，玩纸牌，乘三套马车出游或在一起画水彩画。在索斯诺夫卡，白令学会了吃鱼子，并且开始用俄语交谈。本肯多夫同他一起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和全家都喜爱的阿·康·托尔斯泰的作品。白令直到1945年逝世，一直是俄国的挚友。

白令是从驻巴黎的英国使馆开始其外交生涯的。后来调到哥本哈根。就在这里，他与本肯多夫全家相识。本肯多夫调任驻英大使后，他主动请求调回伦敦外交部。因为他离不开伯爵、伯爵夫人和他们全家了。与这个俄国家庭的深交厚谊，给这位年轻的外交官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按照当时的标准视本肯多夫为欧化的俄罗斯人的化身。后来，白令曾这样描述：“他具有远见卓识，天资聪明，高瞻远瞩，为英俄友谊而努力工作。他喜爱音乐，喜爱我的诗句。他阅读他的叔叔（即任宪兵头目的那个本肯多夫）图书馆里的藏书——拜伦、席勒的作品。他具有较高的谈话艺术，熟知与不同年龄和各阶层人士谈话的要领。他认为，即使一个人不能出身于绅士之家，他也应有绅士的风度。”

在索斯诺夫卡逗留之后，白令不愿返回英国，便乘车前往满洲，目的是接近俄国民众并观察日俄战争。同车前往的还有大使的长子康士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他是应征前往远东当水兵的。在满洲，白令往返于火线。返回莫斯科后，他担任了英国《晨邮报》的军事记者。他采访过斯托雷平<sup>①</sup>

---

<sup>①</sup> （1862——1911年）1906年4月起任俄国内务大臣，1906年7月起任内阁总理，疯狂的反动分子。在俄国历史上所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译注

和维特<sup>①</sup>。1906年他迁居彼得堡，随后又前往土耳其，并于1912年完成了环球旅行。巴尔干战争期间，他任《泰晤士报》记者，久居彼得堡，并创作了关于俄国的戏剧和小说。他与本肯多夫一家的最后交往是他把大使的兄弟巴维尔·康士坦丁诺维奇的回忆录译成英文。那已是30年代，当时，白令说，他是含着眼泪翻译了把百年陈酒倒入厕所的那一段。

白令受到俄国人热情好客，慷慨解囊的性情的感染，频繁来往于彼得堡和伦敦之间。在伦敦他有私人宅邸，出入于上流社会。他出生成长的家庭给他提供了这种环境。他的父亲有自己的游艇，狩猎工具和比赛的骏马。他一家经常应邀去皇家歌剧院，坐进皇家包厢。他的宅邸也以首先使用电灯照明而远近知名。白令的叔叔是温佐尔古堡的城防司令。未来的爱德华七世曾一度住在这里。白令孩提时代曾坐在爱德华之妻，亚历山德拉皇后的膝上（她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妻的姐姐）。

白令通过本肯多夫结识了在欧洲的其他俄国贵族家庭，如舒瓦洛夫，沃尔孔斯基。这些人是通过宪兵头目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十二月党人的亲属И·Г·沃尔康斯基公爵）与本肯多夫一家结识的。同后来的俄国外交部长萨宗诺夫（亡命国外后，死于1920年），白令是在罗马相识的。至于同巴利亚京斯基、乌鲁索夫等人则是在巴黎和彼得堡结识的。但是与白令最亲近的还是俄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那些人：大使的儿

---

<sup>①</sup>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1849——1905）1905——1906年间沙俄内阁总理。——译注

子康士坦丁和彼得·普拉东·扎克列夫斯基，还有他们的一个远亲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本肯多夫。此人也是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世祖同是里加市长约安·本肯多夫（1659—1727）。这个家族到了第三代分为四支：赫里斯托福尔、格尔曼、格奥尔格和约安。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属第四支。当时这位年轻人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职务是那时刚有的新名词——随员。

这样，扎克列夫斯基的妹妹就在白令的府邸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当然，当时在场的还有许许多多伦敦上流社会的名流，如外交家、作家、富翁、勋爵和贵妇。其中就有注意到穆拉的赫伯特·威尔斯。

也是在这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人把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布鲁斯·洛克哈特介绍给了穆拉。这时，他刚到新建的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馆。此后，她在白令官邸和本肯多夫家举行的晚会上，又多次与威尔斯和洛克哈特见面。在伦敦的这一年，在她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1911年她嫁给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本肯多夫。一年后，伊·亚·本肯多夫被任命为俄国驻德国大使馆的秘书。他们迁居柏林。在柏林夫妇二人生活宽裕，无愁无虑。穆拉在宫廷舞会上被介绍给威廉皇帝。穆拉觉得威廉与其英国的亲戚格奥尔格五世相比，显得有些可笑。有一次，她曾在波茨坦宫舞会上与威廉跳过两次舞，她若有所思地回忆：“威廉很幽默。”

本肯多夫在爱沙尼亚有自己的祖传领地。于是他把年轻的妻子带往彼得堡，然后又到列维里。这里有许多有爵位或无爵位的亲戚。本肯多夫在柏林的上司，即大使，也是一位波罗的海的贵族，名叫封·德尔·奥斯汀·萨肯。但是还不

到两年，这位大使及其秘书本肯多夫就不得不离开柏林，于1914年8月携家眷返回俄国。

穆拉的第一个孩子——儿子，生于1913年。现在她又有身孕了。于是便在彼得堡租了一幢房子，女儿生于1915年。穆拉经护士速成班的训练后，进入军医院工作。

三年的战争时期，她是在为孩子的操劳中度过的。她亲自哺乳巴维尔，然后又是塔尼娅，同时还要在军医院工作。当时上层妇女和高级官吏的妻子把在军医院服务视为自己的义务。就在这里，她第一次与彼得堡官场的妇女界有了交往。在她眼里，这些贵妇和她们的女儿们（其中有的还是自己中学同学）都是些愚蠢、肥胖、狂妄的骄奢淫逸之辈。尽管穆拉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但使人感觉到，她是不愿意接近那些女人的。

这几年，她不时回忆起在柏林和伦敦的日子，并珍惜对旧日的回忆。在战争年代，德国军队位于离彼得堡四百公里的阿阿河，战线穿过立陶宛的国土，德军一连几个月围兵里加城下，直到1917年8月攻占该城。但是来自彼得堡的消暑的人们直到1917年秋，德军占领爱沙尼亚前不久，还是照样到自己的领地，到芬兰湾或到纳尔瓦以西的地方去度夏。

战争爆发后，伊·亚·本肯多夫就以中尉军衔到军队的监察机关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本肯多夫得知，短期内不会任命他担任外交职务，便于当年夏天与穆拉、三个孩子和家庭女教师一起离开首都，打算在自己的领地里呆到秋末。但是，秋天他们没能回到彼得堡。十月后，他们获知，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熟人都前往俄国南方，或迁居瑞典，或者改名换姓隐居起来。

穆拉不同意久居乡村。于是，她不顾丈夫和亲戚的劝告，只身返回彼得堡。她要去保护自己的住宅，并就地观察一下是否能同孩子们在彼得堡居住。德军在离列维里一百公里处登陆后，渐渐逼近首都，但穆拉还是到了彼得堡，尽管在途中连她自己都怀疑能否到达目的地。彼得堡的住宅随时都可能被人占住，食品供应也很困难，因此，她必须作出抉择：孤身留在城里，还是返回农村与家人团聚。她犹豫了一个月。但当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决定返回农村时，从爱沙尼亚传来了噩耗：就在圣诞节前夕，邻村的一伙农民夜间闯入她家，把男主人唤出去，用乱棍打死，然后放火烧了住宅。家庭女教师米西带着孩子逃了出来，藏在邻居家，得以幸免。

穆拉现在已无法返回，确切地说，步行返回列维里。因为火车早在十月份就停驶了。谁也不知道战线在哪里，现在是谁和谁打，谁和谁结盟，又有谁还在继续履行对临时政府立下的誓言。

这一段经历，穆拉亲口对我讲过两次，但都是叙述过程，毫不流露自己的感情。穆拉从来或至少在我知道的那几年，不谈自己的感受，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实的，而我们谁也不敢冒昧地问她。她谈起爱沙尼亚那一段的遭遇就象她平时谈话那样干巴巴的。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当她以反提问的形式，用似是而非的话来回答提问者时候，才装出一副小猫般的神情。

由于长兄和丈夫的职位，以及妹妹安娜的出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穆拉就跻身于彼得堡的官吏圈子里。现在，在发生了革命和丈夫被杀之后，她进入了被迫逐者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早在1918年冬就看出了他们

丧失了一切。每个家庭都有人失踪，或者为了生存而潜藏起来。老人则由于折磨和精神上的崩溃而接二连三的死去。

1918年冬的彼得堡还不象夏末那样，渺无人烟，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城。当然，有许多饥民，持枪的人和衣衫褴褛的老人。青年人穿着皮衣招摇过市，妇女系着头巾，男人则戴上了鸭舌帽和便帽，大礼帽不见了，因为它是俄国上层老爷们的象征。戴礼帽每分钟都可能成为毛瑟枪射击的靶子。穆拉街上没有遇见一个熟人。在本肯多夫死去的最初日子里，穆拉感到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记得她，爱她和安慰她——那就是英国大使馆。

穆拉手头既没有钱又没有珠宝。姐姐们在俄国南部，而哥哥在国外。贫民委员会进驻了她的住宅，她只好搬了出来。她有一些女友，但都没有找到，在军医院共事了三年的那些同事们，也没有见到，医生被枪毙，其他人都各奔东西。她找到了亡夫的同事，俄国驻柏林使馆的秘书B·B·约宁。这是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当年的六级文官，为了不被人认出，蓄起了大胡子。她还在滨海大街遇到了前宫廷和皇室领地大臣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索洛夫中将。她的姐夫科丘别伊住在帕夫洛夫斯克的什么地方，详细地址她忘了。总之这些人都帮不了她的忙。

从1919年12月起，位于皇宫沿河大道4号的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馆，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使馆的内部机构进行了改组，重新换了秘书，两位领事被打发回英国，随员们闲坐无事，静待安排。当时正是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前夕，临时政府的朋友、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准备新年后携妻女返回英国。

自本世纪初起，英国驻彼得堡使馆就一直保持了一大批搞秘密情报的中青年人，从职业上看，他们多系文学家。克里米亚战争使英国受到了教益：当时发现维多利亚女皇陛下的政府对俄国知道的太少了，于是决定大力加强情报工作。早在大战之前，布坎南任职期间，就有康普顿·马肯季、高尔斯沃西、阿尔南多、贝尼特、威尔斯和切斯特顿，他写的长篇小说使两代英国人倾倒，都纷纷来到俄国。稍后来俄国的还有与K·A·索莫夫交往甚笃的沃波尔。沃波尔早在1914——1915年就通过索莫夫和俄籍希腊人，王尔德作品的翻译者里基阿尔道普洛挤入了俄国文学界，并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布，格拉祖诺夫以及斯克里亚宾相识。他通晓语言，并写下数部以俄国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此外，在第一次大战时，就已成名的萨默塞特·毛姆也多次来俄国短期逗留。至于白令几乎已定居俄国。劳连斯·阿拉维斯基，随后不久还有年轻的格林拉姆<sup>①</sup>也都曾在首都短期逗留。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已人去楼空，只剩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加洛里德·威廉斯。他是个俄国通，并娶了俄国记者A·B特尔科娃为妻。只有他还在坚持写新闻报道，但发往伦敦也越来越困难了。

使人吃惊的不仅是如此之多的英国文学家从事情报活动，而且交待给他们的任务也特殊。“我国情报部门主要是在具有一定名气的小说家中遴选职业情报分析人员，”后来毛姆回忆道，“给了我一大笔钱，一半是英镑，一半是美元。我应该帮助孟什维克购买武器，收买报界，以使俄国坚

---

① 以上列举的人名均为英国著名作家。——译注

持作战……他们把我派到彼得堡，是因为他们认为我能阻止布尔什维克革命……我告诉他们，我干这种事不行，但他们不相信。好在我是以《新闻周报》记者的身份去俄国写报道的。委托给我的任务——阻止革命，我力不胜任，没有完成。如果他们了解我，就不会派我去了，我没有经验，不知从何做起……”毛姆在晚年曾这样告诉他的侄子。

1918年初，派间谍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时，也同时授予如下的任务：“尽一切可能阻止俄国与德国缔结和约。”

穆拉在大使馆既未找到毛姆，也没找到白令。接待她的是乔治·希尔上尉和她在伦敦时的女友、大使的女儿梅里艾里。此后，她又多次前去，但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其实她也确实没有固定的住处。她暂时住在扎克列夫斯基家的老厨师家里，家人都很喜欢她。复活节和新年过去了。1月7日，星期一，布坎南和11名使馆人员离开彼得堡北上。艾尔弗雷德·诺克斯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没有俄国人前来送行，只有一位俄国妇女来到车站。她就是B夫人。”这可能就是穆拉。诺克斯没有写出姓名是因为他的回忆录写于1920年，当时穆拉还在俄国。

洛克哈特是个什么人物呢？他生于1887年。为纪念斯图尔特王朝奠基人苏格兰国王（1306——1329），这位神奇的英雄被起名叫罗伯特·布鲁斯。这位苏格兰大地主的儿子在忠于苏格兰传统的家庭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中学毕业后，几年内未能选定自己的职业。他游遍德国和巴黎，还去过马来亚。1911年，他突然决定投考外交部。出乎父母和友人们的意料，他竟然被选中。上级派他去莫斯科担任副领事。在此之前，在莫斯科没有设领事馆，近年来英国政府决